

《華盛頓郵報》總編：中國發展決定地球未來

《華盛頓郵報》是美國最富有影響力的主流報紙之一，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輿論具有重大影響力。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華盛頓郵報》如何看待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國際形象的變化？9-11 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政府對媒體百般打壓。在水門事件中名聲大噪的《華盛頓郵報》如何應對來自政府的重重壓力？隨著《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報先後驚曝造假醜聞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節目主持人丹·拉瑟因報導布希兵役記錄失誤而黯然辭職，有人預言長期佔據壟斷地位的美國自由派主流媒體開始走向衰敗。《華盛頓郵報》如何看待這一預言以及它自己在美國主流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長期以來，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各大主流媒體極盡妖魔化中國之能事。如今，《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是否還戴著有色眼鏡？

帶著這些問題，人民網駐美國記者唐勇日前對《華盛頓郵報》總編輯菲力浦·貝內特進行了獨家採訪。

民主可以有很多種定義

記者：根據多項民意調查，伊拉克戰爭後，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國在內）對美國現在的外交做法都感到不滿，美國的國際形象可以說一落千丈。作為美國一家權威主流媒體的總編輯，您如何看待目前在世界上蓬勃興起的反美浪潮？

貝內特：美國的國際形象跟它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美國政府對伊拉克和中東的政策直接相關。9-11 事件過後，布希政府在外交上改變了與同盟國協商的傳統，搞起了單邊主義。在很多重大外交問題上，布希政府都不再跟盟國商量，也不願意在外交上與別國達成妥協，而是只考慮美國自己的利益。布希的做法甚至在美國與盟國的關係中也製造了深深的裂痕。因此很自然，美國的形象在海外特別是在美國的盟國會跌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中國讀者必須看到，美國的形象不是單一的，美國政府的形象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儘管全世界許多人都對布希政府不滿，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對美國文化的熱情。包括電影、音樂等在內，美國文化今天在全世界依然大行其道。美國電影風靡世界，相信在中國很多城市都看得到。互聯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借助互聯網，美國英語在全世界達到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所以，美國的國際形象實在是一個很複雜的話題，其中包含了許多極其複雜的力量。如果

用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來看待美國的國際形象，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記者：布希政府把民主和自由的旗幟舉得很高。但全世界許多人都對美國推行民主背後的動機表示懷疑，認為美國很虛偽，表面上打著民主的旗號，實際上是在謀求自己的利益。您認為呢？

貝內特：布希政府相信，在促進自由民主與實現美國自身利益之間並沒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們堅信，在世界上促進民主，會使得其他國家對美國更加友好，從而更加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

但環顧世界，你會發現，布希政府並未在全世界不同地區推行相同的民主標準。美國是巴基斯坦和沙特的盟國，但這兩個國家顯然都不是民主國家。美國與中國保持了一種複雜的關係，但中國也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你可以把美國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稱為虛偽，或者冠以任何你認為合適的標籤。

美國政府在口頭上宣稱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但在實際行動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布希總統在就職典禮中曾經大張旗鼓地宣稱要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和自由，並把它作為第二任期的第一要務。但就職典禮剛過了一天，布希的立場就出現了倒退。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解釋說，傳播自由和民主只是美國政府的長遠目標，而不是目前即將實行的政策。在處理外交問題時，理想主義雖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我認為，迄今為止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仍然在布希政府的外交決策中佔據主要地位。

記者：美國政府一直認為，美國的民主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一種普世的價值觀。您認為呢？

貝內特：民主可以有很多種定義。作為一名中國記者，我想你一定有你本人對民主的定義，而這個定義是跟中國的歷史和你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相符合的。我也有我自己對民主的定義。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有它們自己關於民主的定義。

讓我舉個例子。在某種意義上講，民主就是讓大多數人當家作主，但民主同時也意味著少數人的權利得到保護。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民主是我們能夠想得到的所有制度中相對說來最不糟糕的一個。」言下之意，民主從來就不是完美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有很多必須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比如美國的民主制度就面臨很多內在的矛盾、挑戰和衝突。所以，民主從來就不是拯救國家的靈丹妙藥，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將壞事都變成好事。民主有它本身固有的利弊優劣。

記者：那麼您認為美國應該領導這個世界嗎？

貝內特：不，我不認為美國或者任何其他國家應當領導這個世界。很難想像，在這個世界上，一個國家或者一群人能夠領導其他國家。讓某一個國家來領導世界是非常不健康的。其他國家的人民或許想與某個大國建立良好關係，或者向它學習有益的經驗，但他們都不希望被一個外國領導。

當今世界是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走過來的。對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危害和缺陷，全世界都已經看得很清楚。有人說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帝國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美國要領導世界，並把美國自己的利益置於其他國家的利益之上。假如這一判斷屬實，那麼這個世界肯定將迎來一個痛苦不堪的未來。

我們未能對政府的說法保持足夠的懷疑

記者：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美國人自己用選票選擇的。而媒體號稱是美國第四權力和無冕之王，對美國民眾的選擇有很大的影響。您認為，在美國外交政策出臺過程中，美國主流媒體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貝內特：我認為《華盛頓郵報》的作用就是監督政府，使其對自己做出的所有決策負責。表現在國際新聞的報導上也是如此。《華盛頓郵報》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設立了一個記者站。我們駐巴格達記者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通過從前線發回的報導告訴讀者布希政府想極力隱瞞的東西。比如布希政府老說民主在伊拉克取得進展，但我們的記者通過獨立的調查報導告訴讀者，事情的真相遠比布希政府所說的要複雜。

通常，這樣的報導會跟政府發生衝突。我們經常面臨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布希政府老是批評我們，說我們的報導跟他們說的不符。我們並沒有屈服於政府的壓力。我們所做的這一切正是為了履行美國媒體的基本功能。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所不能。在對政府進行輿論監督的問題上，《華盛頓郵報》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現在的美國政府在資訊公開方面正全面倒退，很多事情都變得越來越偷偷摸摸，對新聞界也越來越不友好，記者在獲取有關政府的內幕新聞方面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目前我們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跟政府做鬥爭，力爭獲得對許多重要資訊的知情權。我們認為這些資訊應該是美國公眾瞭解的。這些工作花去了我們大量的精力和資源。

記者：這一切都是因為**9-11**事件造成的？

貝內特：的確，**9-11**事件之後，涉及到美國國家安全的許多政府資訊現在都成了國家機密。在全美所有主流大報中，《華盛頓郵報》去年第一個在顯著位置刊登

了美軍在伊拉克虐待俘虜的照片，揭露了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搞到這些照片非常困難，我們費了很大的力氣。所以這對《華盛頓郵報》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美國政府當然非常不滿，認為我們小題大做。我們總是熱情鼓勵和大力支持記者多做一些這樣的報導。

記者：但我的感覺依然是：《華盛頓郵報》似乎不如過去那樣敢作敢為了。《華盛頓郵報》去年 8 月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篇自曝家醜的文章，對該報在有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上的報導進行了沉痛的反思。執行總編輯萊昂納德·唐尼（注：在《華盛頓郵報》，執行總編輯高於總編輯）親自對讀者道歉，認為《華盛頓郵報》的新聞報導有些失衡，對反戰的少數派關注得遠遠不夠。《華盛頓郵報》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

貝內特：我認為有必要先向中國讀者解釋一下《華盛頓郵報》的編輯部運作體制。在《華盛頓郵報》，編輯部分為社論評論部和新聞製作部，這兩個部門相互獨立。作為總編輯，我只能管新聞製作部，管不了社論評論部。的確，在伊拉克戰爭打響前，《華盛頓郵報》的大多數社論和評論都支持攻打伊拉克，但這對該報的新聞製作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當然，在伊拉克的報導上，我們新聞製作部門也有值得檢討的地方。布希政府一直宣稱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我們未能對政府的說法保持足夠的懷疑，而是一再重複報導美國政府的聲音。我們的記者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深挖下去，以便找到證據來挑戰政府的觀點。這一點就是唐尼向讀者道歉的地方。

正如你所說，我們不夠敢作敢為，以致未能大膽挑戰政府的說法。當然，《華盛頓郵報》派駐伊拉克的記者也不可能通過獨立的新聞調查來驗證伊拉克到底有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能夠做到的，只有緊密跟蹤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的行蹤，他們不失為驗證美國政府的說法是否成立的一個有效途徑。但遺憾的是，在伊拉克戰爭打響前，聯合國武器核查小組的觀點跟布希政府已經相當接近，即認為伊拉克很有可能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們當然也只好報導聯合國的觀點。

由此可以充分說明，要在類似有關國家安全的報導中搞到事情的真相，簡直比登天還難。不過通過伊拉克戰爭前後的報導，我們得到了一些經驗教訓。我們知道，我們的膽子的確應該更大一些。

記者：有了在伊拉克報導上的經驗教訓，《華盛頓郵報》的這種失誤不會在有關伊朗問題的報導上重演吧？

貝內特：我們每天都要刊發很多新聞，所以出現錯誤在所難免。如果布希總統明天發表講話說，伊朗擁有原子彈，我們也只能報導他的講話。畢竟總統的一舉一動都是新聞。我們沒有獨立的途徑來立即驗證布希是否在說真話。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可以做一些獨立的調查，來驗證布希的說法，但正如我剛才所說，在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上，媒體很難在國外進行獨立的調查，所以很難對某些問題做出十分公正準確的報導。

不過由於有了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我們現在已經更加小心謹慎，知道哪些地方我們沒有盡力做好。新聞記者可能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自認為自己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畢竟伊朗並非伊拉克。

記者：我想對水門事件醜聞的報導應該是《華盛頓郵報》最光輝的一頁了。您認為《華盛頓郵報》何時才能再現那樣的輝煌？

貝內特：水門事件對《華盛頓郵報》來說極其重要，它是歷史賞賜給我們的一件珍貴禮物。在整個水門事件期間，《華盛頓郵報》也面臨著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要求我們配合政府放棄調查。但《華盛頓郵報》最終用行動表明，勇敢的老闆、勇敢的編輯和勇敢的記者一定會取得勝利。這體現了《華盛頓郵報》的價值觀。值得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們依然沒有失去這些寶貴的價值觀。現在，揭露性的調查性報導仍然是《華盛頓郵報》的重要任務之一。水門事件中的調查記者鮑伯·伍德沃德今天依然在《華盛頓郵報》從事調查性報導工作。

我們珍惜《華盛頓郵報》在報導水門事件上享有的榮耀。記者就是應該去尋找那些能夠影響大多數人的重大題材。改變歷史的機遇將成為沉重不堪的負擔，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抓住這個機遇。幸運的是《華盛頓郵報》抓住了這次機遇。

當然，獲得榮耀並不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主要目的。我們認為，《華盛頓郵報》每天通過新聞報導，向我們的讀者提供有關他們所在社區、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新聞也很重要。我們盡力把這份工作幹好。我們感到，這份事業跟水門事件報導一樣光榮偉大，也是在為民主的發展和國家的興旺做貢獻。

美國主流媒體有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的危險

記者：最近幾年來，美國主流媒體老是出事。《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報先後驚曝新聞造假醜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著名節目主持人丹·拉瑟去年年底也因報導布希兵役記錄出現重大失誤而黯然辭職。這一系列醜聞嚴重損害了美國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有評論家認為，美國主流媒體的壟斷地位正在終結，主流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比如加州州長的改選，雖然《洛杉磯時報》在投票前呼

籲選民不要投共和黨候選人施瓦辛格的票，但最終施瓦辛格還是獲勝了。去年美國總統大選，雖然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媒體都反對布希連任，結果布希照樣連任。這些到底說明什麼？

貝內特：的確，美國主流媒體有越來越走向邊緣化的危險。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國的主流媒體長期被自由派控制。這是因為大多數美國大報都在大城市創辦，而大城市正是自由派和民主黨勢力最為強大的地方。跟一貫信奉自由主義的主流媒體相比，今天的美國社會卻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富有民族主義激情，越來越信奉宗教，對美國以外的外部世界越來越閉目塞聽。從某種意義上講，對這種社會思潮的巨大變動，美國主流媒體反應比較遲緩，在某些領域存在跟主流社會脫節的現象。比如對宗教的作用就重視不夠。《華盛頓郵報》對宗教的報導就比較膚淺，報導視野也不夠開闊。

其次，社會上普遍存在對主流媒體的不信任情緒。每當《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文章，指責美軍在伊拉克進展不順的時候，我就會收到大量讀者的來信和電話，指責《華盛頓郵報》不夠愛國，認為《華盛頓郵報》之所以老是從負面的角度來報導伊拉克戰爭，只是因為該報對布希政府充滿政治偏見等等。很多讀者都認為，我們對布希政府充滿敵意，在新聞報導中有意無意地在傳達報紙自己的政治觀點。

第三，今天美國受眾的資訊來源已經變得非常多元化了。除了報紙和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外，越來越多的公眾依靠網路獲取資訊。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精英報紙過去對新聞和資訊擁有某種程度的壟斷，今天這種壟斷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消解了。

第四，美國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動也對美國主流媒體構成很大的挑戰。今天，美國人花在讀報上的時間已經大大減少，而花在汽車上的時間則大大增加。所以美國主流報紙的發行人數都在下降。《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數雖然下降數量不大，每年減少上千名讀者，但這也是一個令人擔憂的信號。我們目前正在想辦法扭轉這一趨勢。

甚至在讀者成為我們的上帝以前，公信力已經成了我們的上帝

記者：美國傳媒史上曾有一個時期，各報爭著登那些涉及暴力、性、犯罪、流言蜚語、獵奇等黃色新聞，以迎合一些讀者的低級趣味。近來，中國一些媒體也開始大炒特炒低俗新聞，形成一種風潮，對此，一些主流媒體如《人民日報》發表

文章進行了狠批。在這種世界性的小報化風潮中，《華盛頓郵報》是如何保持自己的高品味和高格調的？

貝內特：你說的在美國的電視新聞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今天美國的電視銀屏上充斥著犯罪和煽情的新聞。我經常在電視節目中聽到一些不堪入耳的話語，由於這些詞語太低俗，《華盛頓郵報》永遠也不會在報紙上使用這些詞語。

的確，煽情的小報在美國的許多城市依然還有市場。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竭力想遠離小報式的新聞風格，但坦率地講，小報的新聞價值觀對我們這樣的主流大報仍然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比如《華盛頓郵報》今天刊登的有關名人的新聞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這些名人包括邁克爾·傑克遜等在內的影視明星等。邁克爾·傑克遜的案子目前鬧得沸沸揚揚，有關他的新聞經常出現在《華盛頓郵報》的頭版。其實這個案子跟整個國家並沒有太大的相關。為什麼我們如此重視他？就因為邁克爾·傑克遜是一個身陷性醜聞的社會名流。

記者：那麼，今天美國的小報新聞與 19 世紀末期的黃色新聞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貝內特：黃色新聞的基本特點就是編造新聞，以刺激讀者的想像。今天即使小報所報導的新聞，其準確度和真實度都遠遠超過當時的黃色新聞。《華盛頓郵報》過去一直非常嚴肅。今天，總的說來我們的報紙還是很嚴肅，但相對來說已經不像過去那麼嚴肅了。我想這可能就是小報新聞對主流新聞的影響所致吧。

當然，這也同時反應了美國文化正在改變。正如你剛才所說，美國報紙都是商品，如果沒有讀者來購買它，它就會破產，所以媒體必須跟主流文化呼吸相通。但不幸的是，今天的美國文化正在變得越來越低俗和廉價。

《華盛頓郵報》不搞黃色新聞，也不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我們盡力做的是盡可能滿足讀者多方面的正當興趣。我們已經認識到，除了新聞以外，我們的讀者對很多東西都感興趣，比如名人、時尚、家居裝飾、健康等，這些都是美國大報過去很少關注的領域。

記者：《華盛頓郵報》是否建立了某種機制，以確保像《紐約時報》和《今日美國》報那樣的醜聞不在該報發生？在防止虛假新聞方面，你們吸取了什麼樣的經驗教訓？

貝內特：我們有很多經驗豐富的編輯負責對記者的稿件進行審核。如果一旦發現問題，或者某些稿件有虛假的嫌疑，編輯就會提出問題，我們就會展開調查。我們也僱傭非常有經驗的記者。

但是坦率地講，要百分之百地防止虛假新聞出現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每天要刊發很多稿件，我們的編輯記者加起來一共有 **850** 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幾乎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提前發現所有想要作弊的人。幸運的是，《華盛頓郵報》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出現那樣的醜聞了（注：上個世紀 **80** 年代，《華盛頓郵報》女記者珍妮特·庫克以杜撰的八歲吸毒小女孩吉米的故事騙得普利策獎）。所以我認為我們的這套制度還是有效的。當然，今天我們依然隨時保持高度警惕。要知道，報紙的公信力就是一切。可以說，甚至在讀者成為我們的上帝以前，公信力已經成了我們的上帝。如果我們失去了公信力，我們就會失去所有的讀者。

記者：您們是如何強化編輯記者的這種公信力意識的？

貝內特：《紐約時報》醜聞發生以後，我們在編輯部內建立了許多新的制度。我們在編輯部內確保盡可能高的透明度和溝通性。所以我們的新聞編輯室才会有這麼大，大家在一起辦公。所以我的辦公室總是對所有編輯記者敞開。如果一旦發現問題，我們可以馬上進行處理。在編輯部內部保持自由的討論，也是確保報紙公信力的重要手段。

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正在變得日益成熟

記者：我的印象是，《華盛頓郵報》經常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專制國家，那裡的人民沒有民主，沒有自由。為什麼《華盛頓郵報》對這些負面的字眼如此感興趣呢？

貝內特：我不同意你的說法。包括《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在內，幾乎所有美國大報今天都不再將中國稱為專制國家。《華盛頓郵報》已經有很長時間不再使用類似這樣的字眼了。今天，我們依然稱中國為共產黨國家，那是因為這是一個事實，中國的確是為共產黨所統治的。

今天，《華盛頓郵報》正在努力嘗試去理解和反映中國的複雜性。去年該報就發表了好些篇有關中國市民社會的長篇報導。這些報導的主題多種多樣，涉及到網路、工人、民工、政府與市民的衝突等等。這些報導全面反映了中國的複雜性。

中國是一個大國，每天都在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這些事情很多是自相矛盾的。比如中國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在短時間內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脫貧，但同時中國也面臨很多挑戰，比如貧富分化加劇等。經濟領域進展很大，但政治改革卻進展很慢等。中國領導人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記者：您有什麼好的建議嗎？

貝內特：我們都應該拜中國為師。中國對美國人生活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在過去 50 年中，在美國發生的一切影響到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今天，中國的作用跟美國有異曲同工之妙。作為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中國將對世界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經濟領域。這一點對美國來說也不例外。

記者：正因為如此，《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才應該更加負責任。不是嗎？

貝內特：我們將盡其所能。以歷史的眼光來看，《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導正在變得越來越成熟。過去，《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內容比較單一，基本上都集中在報導政府新聞。今天，從某種意義上講，政府新聞已經成了最受《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冷落的一個角落。中國的社區、鄉村、商業、經濟、文化和科技創新等領域正吸引著我們越來越多的目光。這些領域的新聞比政府新聞有意思得多。

記者：但我的感覺依然是，貴報對中國的報導仍然主要集中在一些狹隘的政治話題上？

貝內特：不，這是不對的。如果你調查一下 2004 年所有美國大報的對華報導，你就會發現，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題材和範圍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拓。可以說，2004 年是美國媒體在中國派駐常駐記者以來對華報導最豐富多彩的一年。在過去，我們派駐中國的記者中文都不太靈光，今天所有駐華記者都能講流利的中文。在過去，我們的駐華記者基本上不怎麼出差，老是呆在北京。今天他們已經全國各地到處跑了。在過去，中國共產黨的黨代會和人大政協的兩會往往是駐華記者報導的重中之重。今天黨代會和兩會不再是我們的駐華記者關注的焦點。他們對中國的環境問題、學生教育問題、商業問題、官員腐敗問題以及一些文化問題更感興趣。一句話，我們對中國的報導越來越豐富了。

在我被提拔為總編輯之前，我是《華盛頓郵報》主管國際新聞報導的副總編。當時《華盛頓郵報》在中國只有 1 個記者，而在俄羅斯有 3 個記者。今天我們在俄羅斯只有 1 個記者，在中國的記者數量卻增加到了 3 名。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我們對報導中國的重視。我個人甚至認為，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重視程度超過了成天忙於伊拉克問題和反恐的美國政府。

當然，總的說來《華盛頓郵報》在中國的報導力量還是相對較小。在一個 13 億人口的大國僅僅派駐 3 名記者，其實還是很不夠的。但是我們已經在努力，爭取做得最好。

記者：所以您認為貴報對中國的報導是公正、客觀和平衡的？

貝內特：總的說來，《華盛頓郵報》對中國的報導是客觀公正和平衡的。布希政府裡的一些政客經常會說出一些羞辱中國的言辭，以及一些對中國非常負面的評價。相比之下，美國媒體要平衡得多。我認為像《華盛頓郵報》這樣的主流大報並未跟在這些極端反華的政客身後跑。我們所做的是儘量報導中國的全貌，而不是糾纏於一些引起爭議的細枝末節。

如果我是年輕記者，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中國

記者：貴報駐中國的記者會遇到採訪方面的困難嗎？

貝內特：會的。但我們的記者在華盛頓也同樣會遇到這個問題。所以我並不期望中國政府對外國媒體徹底開放，僅僅因為美國記者希望他們這麼做。在過去，我們很難拿到中國的簽證，也很難在中國旅行。現在情況已經好多了。我猜想情況大大好轉的原因是，中國政府認識到，讓外國記者進入中國，給他們提供法律許可範圍內盡可能好的報導自由和條件，讓外國記者報導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用擔心受到報復，具有重大的意義。如果我今天還是一個年輕的記者，正在考慮到哪裡去從事我的新聞事業，我會好不猶豫地選擇中國。

記者：是嗎？

貝內特：當然！我認為中國目前是一個美國記者從事新聞工作的最好舞臺。

記者：那您去過中國幾次呢？

貝內特：三次。第一次是在 **1999** 年年底和 **2000** 年年初。第二次是 **2001** 年 **3** 月，期間我有幸採訪了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第三次是 **2003** 年 **11** 月，期間我又採訪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感謝《人民日報》領導的熱情邀請使我的訪華行程能夠成功。在北京期間，我曾經專門參觀了《人民日報》在北京的總部。

記者：請問您本人對中國和中國普通老百姓有何印象和感受？

貝內特：中國真的讓人感到有難以置信的活力，發展潛力巨大，景色無與倫比，中國文化也是如此豐富多彩。每次到中國，我都看到和學到了一些新東西。每次到中國，我都感覺自己看到了世界的未來。真的，中國今後如何發展將決定這個星球的未來。

記者：您對中國領導人的印象如何呢？

貝內特：我認為自己沒有資格來評價中國的領導人。每次當我採訪中國領導人的時候，我都感到他們準備充分、應答自如，知識淵博，富有遠見，對中國在世界

舞臺上扮演的角色充滿了自信。我認為，中國領導人真的很辛苦。他們要管理的這個國家如此龐大，又有這麼多的問題需要對付。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了。

出自人民網 **2005年3月27日**